

汪海波 吕 政 主编

新中国 工业经济史 (1958-1965)

汪海波 董志凯 等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汪海波 吕 政 主编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1958—1965)

汪海波 董志凯 等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郝光明
技术设计 蒋 方
责任校对 孟赤平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1958—1965)

汪海波 董志凯 等著

出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8号 邮编:100035)

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国马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7印张 180千字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118-080-1/F·81

定价: 11.8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邮编:100836)

序

1986年,我们主编并出版了《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一卷本)。^①后来,基于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和经济工作的需要,拟将原来出版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一卷本扩展为四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四卷本已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并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本书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对经济史实的研究和叙述,具体地阐明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并试图着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对已经问世的、浩繁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史料作出新的概括,试图在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期,篇章节安排,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实施和结果的系统叙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典型史料与统计资料的结合运用,以及历史事件的评价等方面作出新的探索和比较客观的分析。

本书对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期,其主要标准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变化状况(以正标题表示),次要标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以副标题表示)。基于这一点,我们将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史分为以下六个时期:

第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经济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经济(1949年10月—1952年);

^① 主要作者有汪海波、俞恒、马泉山和吕政。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第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工业经济

——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建立时期的工业经济(1953年—1957年);

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一)

——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时期的工业经济(1958年—1960年);

第四,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二)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经济(1961年—1965年);

第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经济(1966年—1976年10月);

第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工业经济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经济(1976年10月—)。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叙述的是第一、二两个时期。该书已由经济管理出版社于1994年7月出版。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58—1965),即本卷叙述的是第三、四两个时期。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6.10)和《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76.10—)分别叙述第五和第六时期。^①

本卷的写作框架是由主编提出的,与有关作者讨论后定下。本书各章的写作者是:汪海波,第一篇第一、五章和第二篇第一、六章;董志凯,第一篇第二章;剧锦文,第二篇第二、三章;徐洪才,第一篇第四章和第二篇第四、五章;董小君,第一篇第三章。在各章作者反复修改成稿的基础上,主编统改定稿。

① 以上各点详见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经济管理出版社(下同)1994年版,第1—56页。

本卷写作同《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卷保持了相同的体例。本卷的目录序号共分四级,即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一。此其一。其二,除引文外,本卷所用的数字,一般都是用阿拉伯字书写的。其三,本卷引用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著作,大部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卷引用的统计资料,绝大部分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为省略计,在正文附注中未注版名,只是在主要参考书目录中才注了版名。

本卷的写作是以一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为基础的。首先吸取了其研究成果,还吸收了其有关论著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向有关作者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本卷作者和编者的水平限制,书中会有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汪海波 吕 政

1995年2月20日

目 录

第一篇 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一) ——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时期的工业经济 (1958—1960)

第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方针的形成…………… (1)

第一节 毛泽东发动批判反冒进：“大跃进”方针形成的 思想基础…………… (1)

第二节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大跃进”方针形成的路线基础…………… (7)

第二章 工业生产建设实施“大跃进”的方针 …… (11)

第一节 1958 年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工业“大跃进” …………… (11)

一、全民大炼钢铁的兴起…………… (11)

二、机械等其它工业部门的“大跃进”…………… (19)

三、地方工业“跃进”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23)

第二节 1959 年上半年对工业生产建设指标的调整 …… (25)

一、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压缩空气”…………… (25)

二、降低工业生产指标…………… (27)

三、纠“左”的不彻底…………… (31)

第三节 1959 年夏庐山会议后再次掀起工业生产建设的 “大跃进” …… (34)

一、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发动反右倾斗争…………… (34)

二、反右倾后制定新的“跃进”指标…………… (35)

三、以“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 (38)

第三章 改进工业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制度	(44)
第一节 改进工业的经济管理体制	(44)
一、实施改进工业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	(44)
二、改进工业经济管理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和初步调整	(53)
第二节 改进工业的企业管理制度	(58)
第四章 手工业合作组织的“转厂过渡”	(68)
第五章 1958—1960 年工业生产建设的成就和“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及其主要教训	(73)
第一节 1958—1960 年工业生产建设的成就	(73)
第二节 “大跃进”的严重后果	(76)
第三节 “大跃进”的主要教训	(84)

第二篇 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二)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经济

(1961—1965)

第一章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	(95)
第二章 工业生产建设实施调整方针	(98)
第一节 1961 年初步调整	(98)
一、1961 年上半年在调整中徘徊	(98)
二、1961 年 8 月以后,开始切实贯彻调整方针	(101)
第二节 1962 年进入全面调整的决定性阶段	(103)
一、进一步统一认识	(103)
二、坚决贯彻调整措施	(108)
第三节 1963—1965 年继续全面调整	(127)
第三章 再次集中工业经济管理权限和试办托拉斯	(136)
第一节 再次集中工业经济管理权限	(136)
第二节 试办托拉斯	(151)
一、试办托拉斯思想的提出	(151)

二、试办托拉斯方案的出台	(156)
三、托拉斯试办的状况	(158)
第三节 调整后期重新扩大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	(164)
一、放权思想的重新提出	(164)
二、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	(165)
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166)
第四章 整顿国有工业企业.....	(168)
第一节 整顿国有工业企业的历史背景:制定《工业七十 条》的起因	(168)
第二节 整顿国有工业企业的指导文件:《工业七十条》 的主要内容.....	(170)
第三节 整顿国有工业企业的措施:试行《工业七十条》	(179)
第五章 整顿手工业集体企业.....	(186)
第一节 整顿手工业集体企业的历史背景:制定《手工业 三十五条》的起因	(186)
第二节 整顿手工业集体企业的指导文件:《手工业三十 五条》的主要内容	(187)
第三节 整顿手工业集体企业的措施:试行《手工业三十 五条》	(194)
第六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工业生产建设的主要成就 和基本经验.....	(196)
第一节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工业生产建设的主要 成就.....	(196)
第二节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发展工业生产建设的 基本经验.....	(202)
主要参考书目.....	(209)

Contents

Preface

Part One Industrial Economy in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I)

— Industrial Economy in the Socialist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Chapter 1 Formation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hapter 2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hapter 3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s and Enterprises Management

Chapter 4 Transformation of the Handcraft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sations

Chapter 5 Achievement of the Industrial Economy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art Two Industrial Economy in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II)

— Industrial Economy in the Adjustment Period(1961—1965)

Chapter 1 Policy Formulation of the ‘Adjustment, Consolidation, Strengthening and Enhancement’

Chapter 2 Implementation of the Adjustment Policy in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 Chapter 3 Re-centralization of Industrial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a Pilot Scheme of the Trust
- Chapter 4 Re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Chapter 5 Reorganization of the Handcraft Collective Enterprises
- Chapter 6 Major Achievements of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Experienc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ferences

第一篇 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时期的工业经济(一)

——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时期的工业经济
(1958—1960)

第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 方针的形成

第一节 毛泽东发动批判反冒进：“大跃进” 方针形成的思想基础

我们在《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一书中,详细地叙述了“一五”时期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一条基本经验:不断克服急躁冒进倾向,使得工业生产建设规模和速度与国力相适应,使得经济获得稳定、持续、高速增长。该书还着重提到:1956年的急躁冒进主要来自作为当时党和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因而来势甚猛。只是由于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坚持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因而1956年虽然没有完全避免这种倾向,仍然发生了局部性的冒进错误,但却防止了可能发生的1958年“大跃进”带来的那样的大灾难,并使1957年的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1956年所进行的反冒进倾向斗争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为当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

正确的经济决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比如，周恩来依据反冒进斗争的实践经验，代表党中央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的较均衡地发展。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也以这些认识为依据，提出了发展经济的正确指导方针，着重强调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①

这里需要着重提出：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说，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进行的反冒进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坚持贯彻了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而这项原则之所以能够贯彻，同当时党的主席毛泽东遵守了这项原则是紧密相联的。

但如前所述，1956年的急躁冒进主要是由毛泽东来发动的，他对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这一点，突出表现他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针对当时的反冒进，提出“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接着他还把1956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上的反冒进，同1955年上半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反冒进联系起来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后来我们说不应当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②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对1956年的反冒进是持有不同看法的。到1958年批判反冒进时，毛泽东就更明确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的是妥协方案，是用来挡水的，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③但是，在党的八届二中全

① 详见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第475—4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5页。

③ 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559页。

会上,毛泽东对当时进行的反冒进,毕竟没有正面提出批评,而且同意 1957 年执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① 这除了上述的当时他还能够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以外,同他当时注意力集中在 1956 年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和赫鲁晓夫发动的对斯大林批判上,也很有关系。这一点,也促使他当时对反冒进采取保留态度。

但到 1957 年下半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际方面,波兰、匈牙利的风波已经平息;在国内方面,反右派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1957 年冬农村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 1955 年底提出的批判经济发展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经济发展的主张^② 又被提到了日程。这样,在他看来,批判同这一主张相悖的反冒进也就成为紧迫的任务。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主持的批判反冒进,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党的中央会议进行的。这场批判发端于 1957 年 9、10 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去年(1956 年—引者)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他主张恢复这三个东西。^③ 这在实际上不仅否定了 1956 年反冒进的正确实践,而且否定了 1956 年 5 月党中央提出的、又为同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所坚持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方针。^④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当前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

① 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559 页。

② 详见《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23—22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74—475 页。

④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下同),第 85 页。

矛盾。”^① 上述各项都是党的八大的决议，而毛泽东却把它们否定了。这意味着毛泽东开始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八大之上，是严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开端。所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似乎可以看作是由1935年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向又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左”倾路线（如前所述，远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而且表现在经济建设方面，还表现在组织原则方面）变化的重要转折点。

在这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和《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等社论。这些社论提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② 这就把批判反冒进，向全国推开了。

1958年1月上旬，党中央召开了杭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反冒进，并点名批评了周恩来。同月中旬，党中央又召开了南宁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主要是批评陈云。同年2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同年3月，党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又多次批评了反冒进。^③ 同年4月上旬，毛泽东又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一次汇报会，继续批判了反冒进。^④

直到同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工作报告中，对批判反冒进问题作了结论。他指出：一些同志“认为一九五六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1956年反冒进的“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的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还形成了一个“马鞍形”，即“1956年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②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和12月12日。

③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第205、208页。

④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0—641页。

—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①会上，与反冒进有关的领导人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等也都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结束前宣布：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我们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②至此，批判反冒进问题告一段落。

现在需要进一步叙述毛泽东在批判反冒进时提出的几个重要论点，^③以便进一步说明这个批判为“大跃进”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毛泽东认为，反冒进的性质还不是路线问题，而只是一个时期（即1956—1957年）一个问题上（即建设规模和速度）的方针性错误。并且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在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方针，而反冒进则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实践证明，这是把是非弄颠倒了。

第二，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还认为，反冒进和右派攻击二者之间是相关联的。二者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十分重视发挥群众积极性，而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但对来自群众的超越客观条件的积极性加以正确的引导，不仅不会挫伤、而且正是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至于把反冒进与右派攻击联系在一起，那就不总是一般地混淆是非，而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当然，反右派斗争也存在严重扩大化问题。

第三，毛泽东认为，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平衡是积极的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依据这个思想，《人民日报》发表了

① 《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号，第6页。

② 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2页。

③ 参见同上书第637、643—645、648—649页。

题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提出：“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① 应该肯定。在客观条件允许的限度内，运用毛泽东的积极平衡的理论，对于发挥生产潜力、促进经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要超越客观条件运用这个理论，必然造成经济失衡。从这方面来说，毛泽东的积极平衡理论，为 1958 年以钢铁工业高指标作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方针提供了一个极重要的理论支柱。

这里还要着重提到，毛泽东在批判反冒进时甚至武断地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② 这实际上意味着以后不许反“左”，只许反右。

正是上述这场批判反冒进的实践和理论，在思想乃至在政治、理论和组织等方面为制定和推行“大跃进”方针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以致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极为愚蠢的、从 1958 年开始并长达 3 年之久的“大跃进”，^③ 迟迟得不到纠正。

但这场反冒进与批判反冒进的原则是非，在 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终于得到了澄清。1981 年 6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指出：1956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

① 《人民日报》，1958 年 2 月 28 日。

② 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44 页。

③ 这里没有论及 1959 年上半年对生产建设高指标所作的某些调整。